

跋周法高先生「上古語末助詞‘與’(歟)之研究」兼論論語中「君子」一詞之詞性

楊 聯 陞

關於論孟兩書裏「與」同「乎」的用法不同之處，我曾想到過一種說法，就是，「乎」字上面的主要語法成分，往往是一般的動詞或形容詞（相當於日語的「用言」，下面帶補足語的也在內）；「與」字上面多數是名詞或其代用語（相當於日語的「體言」），而全句的結構，往往相當於白話的「是……嗎」，即判斷句式。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初，我先同趙元任先生通信略略談過這個問題，不久又同周法高先生討論。周先生覺得此說雖有道理尙非其全。這我自然承認。周先生又檢出他自己的舊稿，其中有「與」句問者往往期待相反的答案一點，孟子許行章裏的例句，最爲明顯。我覺得很有趣。當時我們商定，分檢先秦古籍，有引得的利用引得，等有了結果，合寫一篇文章，預備給趙元任先生祝壽。

過了幾個月，我看到 A. C. Graham 在 *BSOAS* 19.1 (1957) 105—123 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目是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final particles *yu* 與 and *yee* 也”。他特別強調「與」同「也」的對等關係，指出二者都常用爲係詞 (copula)。在論孟之中，有一百餘條用「與」，其中五分之四，都顯然是「也」字的問句。另外他還在幾種古書裏作了些統計，結論是「與」相當於「也乎」。

我看了 Graham 這篇文章，覺得其中雖有可以補充之處（例如，他沒有指出「抑」等於白話的「還是」，因此下面的問句用「與」），不過大體言之，也可算是探驪得珠了。因此又與周法高先生商量，取消原定的合作計劃。請他自己單獨寫一篇文章，由我寫一篇跋，跋裏可以提到我對於論語中「君子」一詞的意見，這也是一個與「乎」「與」對照有關係的問題，在我心裏蓄藏了有好幾年了。

周法高先生說的「與」的問句同相反的回答有關這一點，自然是他獨立的發現。

不過我最近在臺灣大學國文系圖書室見到日本學者東條一堂作的一堂助語新釋（明治三年）也提到相似的一點。卷二說，「乎」是「心已決之而不敢定之詞」，「與者不執定詞」，又說「觀對之『然否』」，可知問之『乎與』（這句是我的譯文）。妙在他也舉孟子許行章為例，如「許子冠乎」，知道人大概要戴帽子，所以用「乎」；下面「自織之與」，不可量而知，故以「與」問而聽其答。（一堂又說：莊子有「然與」「然乎」，「與」是問辭，「乎」是反辭。這個觀察，也可注意。）一堂之子東條喆附載云：「乎者知其大略當然而不敢質言之辭，與者謙其不執定而設問之辭，邪者帶疑而未定之辭。」是申述其父之說。此說著重「乎」問的蓋然性，與周先生之說正可互相補充。

我想，還有一點可以附帶說的，就是「自織之與」「自爲之與」，這兩句，重點不在動詞「織」「爲」，而在修飾語「自」。用現代口語說，就是「是他自己織的嗎」「是他自己做的嗎」，還是判斷句式。織同爲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在於織者同爲者是不是許行自己。因此這裏用「與」而不用「乎」。

從上面一段，我們可以推論說，採用判斷句式，或用「與」而不用「乎」，可能是爲了加強語氣（期待反面答案的問句也往往是加強的）。不過加强的部分，不必是動詞，也可以是動詞的修飾語。如「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加强的部分，是前半。用白話說，就是「周公是知道他要造反還派他去的嗎？」

關於論語裏「君子」這一個詞的詞性，首先提出問題來的是章太炎先生。在制言十四期的「菑漢閒話（十六）」，章先生說：

讀古書須明辭例，此謂位置相同，辭性如一，如同爲名物之辭，或同爲動作之辭是也。然尙有不可執者。論語發端便云，不亦說乎，不亦樂乎，不亦君子乎。君子與說樂，辭性豈得同耶！或者拘攣過甚，同爲名物，尙以天成人巧，動物植物，瑣細分之。流衍所極，必有如宋人說滕王閣序以落霞爲霞蛾者。高郵王氏父子，首明辭例，亦往往入於破碎。如秦風「終南何有，有紀有堂」，與「有條有梅」相偶，同爲名物之辭也。王氏以其屬對未精，必依白帖改紀堂爲杞棠。商頌「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傳曰：「求，玉也」「共，法也」。亦同爲名物之辭。王氏又以屬對未精，必依大戴記一本及淮南高誘注，改共爲拱，引廣雅「拱球法也」說之。苟充其類，則霞蛾之說，亦不可破矣。

我對於太炎先生這個說法，不能完全同意。霞蛾之說，誠然欠妥。不過「有杞有棠」「受小拱大拱」似乎都較舊說爲勝。瑞典高本漢先生，譯注詩經，在這兩處好像也採用王氏之說。

至於「君子與說樂，辭性豈得同」，這個問題。我覺得在這裏，因為句法同是「不亦……乎」，同形代替，辭性應該相同。在論語裏，還有「其爭也君子」（八佾），這個句法（或公式）與「其爲人也孝悌」相似。這裏君子一詞，也有用言性。譯成白話，就是說，「很像一位君子」。

另外一種公式，是「君子哉若人」（兩見於公冶長及憲問），這與「君哉舜也」的君，詞性相同，都是用言。（下邊「尙德哉若人」，尙德自然是動詞帶補足語）還有，「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雍也），在「然後」之下，似乎也得是用言。

至於「君子」作修飾語，例子更多。如「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泰伯）不說「君子與，君子也」，很可玩味。還有「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述而），「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雍也），「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公冶長）。還有「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這幾句不大好懂。Graham 以爲這兩句用乎而不用與，是例外。我想，如果大體依照朱註，也許可以說「君子者乎」「色莊者乎」上面，各省了一個動詞「與」字。不過這也只能備一說而已。

在一般的古籍裏，「君子」只是名詞，而在論語裏，除掉作體言外，還有作用言之例。這個現象，怎麼解釋呢？我猜想，這可能與「君子」的兩種意義有關。君子可以是「有位之人」，也可以是「有德之人」。兩個意義之中，「有位」大約早於「有德」，這是很多學者都注意到的。論語一書，特別着重君子之德。也許是在春秋時候（或下至戰國初期）這個「有德之人」的意義，漸漸通行，而「有位之人」的意思，也還很常用。在這個過渡時期，發生了君子有兩種詞性這個情形，而君子作爲用言之時，似乎限於「有德之人」，也許是便於分別。後來等到「有德之人」佔了絕對優勢，這個區別也就不必要了。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我在日本京都的同志社大學講「君子之詞性」，請京都大學教授小川環樹通譯。在演講之前，小川先生看了我演講的草稿，提醒了我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引的君子作用言之例，大抵出於上論。日本學者，如武內義雄論語之

研究引伊藤仁齋論語古義以爲上論十篇比下論十篇爲古。又哥倫比亞大學的 R. A. Müller 博士曾研究過論語裏面的助詞 (particles)，也發現上下論有別。(我未見 Müller 文)。我很感謝小川先生這個提示。又想起李玄伯 (宗侗) 先生近來論「夫子」與「子」(集刊二十八本慶祝胡適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他說，論語中「夫子」是第三位，「子」是第二位稱謂，與左傳國語中同。只在後十篇中，有三處用法改變，就是先進篇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陽貨篇的「子之武城章」「佛肸章」。這也是上論下論有別之一證。